

海外视野

博士后的苦与乐

郭英剑

21世纪以来,在西方高校和学术界,特别是英美学界,对于博士后研究的认识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博士后研究”已经不再是过去人们心目中普通的学术“打工”,它已经演变成成为大多数博士学位获得者进入学术界的一条必经之路。

博士后,不是博士生生活的延续

在过去,博士学位就是进入学术界的一张门票。有了它,人们进入学术界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了。虽然还有不少博士可以直接进入高校任教,但大多数博士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博士后群体的包围之中,在未来高校职场的竞争中,自己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所谓博士后,是指在获得博士学位(PhD)后在相关研究领域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目的是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获得更多的学术训练,或者从事教学,为的是在未来进入学术界或者相关研究领域工作。

记者快评

师德「一票否决」的乙次方

陈彬

近日,针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的新闻再次出现在媒体中间,虽然很多人对此已经“无感”。

11月16日,教育部下发《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表示对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

之所以笔者认为很多人对此会“无感”,是因为近些年来,类似的通知、意见、人们看到的已经太多了。以下仅举数例——

2013年5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意见,表示要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2014年10月,教育部出台意见,强调高校教师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应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职务(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

2016年9月,教育部出台意见,要求加强师德考核力度,将师德考核摆在高校教师考核的首位,实行师德“一票否决”。

2017年9月,教育部发布工作指南,提出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2018年2月,教育部出台意见,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研究生导师及培养单位视情况处理;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

从2013年至今,几乎每年,师德“一票否决”都会借着不同的文件,出现在公众和教师面前。然而,我们的高校整体师德状况真的有一个明显提升了吗?

似乎没有,毕竟就在不久前,“程颖事件”还历历在目。

在此,笔者并不是对“师德一票否决”这一政策本身存有异议,该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相同的政策重复出现,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政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么是政策执行不力。而在“师德一票否决”这个问题上,可能这两者兼而有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师德失范者给予处罚,不管这一处罚力度如何,其本质上都属于“结果监督”,即不对教师形成师德失范的过程加以控制,只对“师德失范”这一结果采取措施。这种方式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对问题的简单化处理看似力度很大,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惩戒失范者、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因此,在教师师德失范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的“结果监督”转变为“过程监督”呢?要知道,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对青年教师成体系化的师德教育,大学教师依然是唯一一群可以在未接触任何师范教育的情况下,就能进入课堂的老师,对于整体的师德师风监督管理,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学生考评上。

对此,我们是否应该多花一些心思,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新办法,而不是每年重复一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固有政策呢?要知道,如果一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只有“1”的话,无论它的乘方是几,其得到的结果依然只是“1”。



图片来源:全景网

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0年,美国曾推出一份题为《应强化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博士后经历》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具有博士学位者成为科学家与工程师之前,应该倡导他们首先具有博士后经历。

该报告开宗明义,数十年来,学术界对博士后训练体制的忧虑绵延不断。《经历》认为,人们一直怀有的那份不安与担忧并无太大变化。

在《经历》的调查中,作者发现,只有少数在高校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才有机会获得高级研究者的指导和高水平的学术训练,发挥个人的研究思路,获得实验室的管理经验,申请基金资助,得以与其他学者交流,最终走上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常聘岗位。

再次,博士后收入太低,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最后,博士生缺乏指导,无法尽快成长为独立的研究者。

为此次《报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第一,博士后的时长最多不超过5年。这个时间包括了因病、因家庭原因而导致的离职时间。

第二,博士后仅限招收那些将要接受高水平学术训练的人们。未来,要保证他们进入学术界,从事学术或者科学研究。

第三,提高博士后收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应该将国家博士后研究基金(按照2014年的标准)提高到5万美元,且要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博士后的收入要高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博士后所在高校也要给予博士后相应的福利待遇。

域外传真

清查学生手机电脑,学校的手伸得太长了

熊丙奇

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的一份涉及“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的通知文件引发网络热议。该校负责人具体审批、落实这项清查的保卫处蒋姓工作人员称,“现在学校相关部门的几位领导正在商量对这个文件还要不要改,考虑到清查学生手机涉及到隐私等问题,清查的范围可能会减小。”

我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依依法治国是我国发展教育的基本方略,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维护基本的教育秩序,保障办学者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学校是育人的地方,培养学生有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意识是教育的基本职责,如果学校制定的校规都不遵守国家法律,那么,又如何培养遵纪守法的合格社会公民?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理清政府部门、学校的权

确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还有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博士后人数急剧增加,但增加的比例大多是依靠导师项目资助的博士后。与此同时,导师的人数并不同步增长,造成博士后们无法得到或很少得到相应的适度训练与指导。

博士后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经历》报告指出,从体制上看,人们从事博士后研究之难,问题出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博士后时间不定,有些时间超长,有些几经转化。时间超长,不利于博士后的培养。其次,博士后在名义上被误解了——无论什么人,未来是否愿意从事学术,都可以进来工作。

再次,博士后收入太低,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最后,博士生缺乏指导,无法尽快成长为独立的研究者。

为此次《报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第一,博士后的时长最多不超过5年。这个时间包括了因病、因家庭原因而导致的离职时间。

第二,博士后仅限招收那些将要接受高水平学术训练的人们。未来,要保证他们进入学术界,从事学术或者科学研究。

第三,提高博士后收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应该将国家博士后研究基金(按照2014年的标准)提高到5万美元,且要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博士后的收入要高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博士后所在高校也要给予博士后相应的福利待遇。

最后,博士后所在高校应该鼓励博士后从更多的导师那里获得指导。而且,要通过各种评估形式的措施,保证这种指导是高水平的和有价值的。

该报告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暗含着,由于市场需求量不足,博士后的数量应该有所下降。实际上,目前很多博士后无法找到工作,难以拿到常聘职位,因此,目前太多的博士后数量,至少在某些领域应该有所下降。

博士后心声:苦与乐

从2015年到现在,3年过去了。情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按照3年前《经历》报告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尚没有足够的变化。最主要体现在,工作市场中的工作数量更少;博士后基金更难获得;某些领域发表论文的压力更大,发表的门槛则更高了。

在整个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对于发表学术论文有忌惮之外,几乎所有博士后对于未来的前途都忧心忡忡。

英国约克大学的哲学博士康特希提到未来的工作市场时所用的词汇是“糟糕”“可怕”和“太难了”。他的愿望是未来能够在所好大学谋到一个常聘职位。

对于女性博士后而言,如果在做博士后期间怀孕生子,生活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学术研究,是很多女博士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无论如何,博士后群体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居于学生序列的最顶端,但又在学术界的门槛边上。如果高校和研究机构能够更多地关心他们,照顾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学术研究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那么,他们积累多年的学术成果甚至会以井喷的方式爆发出来,为学术界作出重大贡献;如果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无法使他们安心于学术研究,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一事无成,或者事业平平,即使是有小成果,也无法达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

因此,博士后群体,需要引起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些额外精力的付出,使老师们能够讲授的知识容量和难度,较之预期大大缩水,课因此上得既慢又浅。当老师们用心去备课、精心去策划时,这些学生却无动于衷。反应冷漠的他们,上完了一节课以后,甚至夸张到都不知晓老师的性别。

大家所见的是,只有通过媒体曝光,违法、违规的校规才会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对违法、违规校规的处理,往往只是停止执行,学校有关负责人并不会被追究责任,而这类行为的结果很严重,不仅相关学校负责人要被追究责任,同时也会对学校的教育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要实现教育家办学,在办学中就要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师生权利,必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实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高教观点

提及乞丐,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们,脑海里可能会立刻出现这样一个形象:衣衫褴褛者拿着一只破盆,走村串户或是站在人潮涌动的街头,不断地用哀求的语气重复着同样的言语,“可怜可怜我吧”。

提及大学生,我们这代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美好印象:衣着整洁地手捧着一摞书,步履匆匆地行走在宁静的校园里,或是走向神圣的课堂,或是走进宽敞的图书馆。课下或是周末时光,他们会三五成群地结伴而行,或是赏风景,或是尝美食,他们总是那样的活力四射,青春飞扬。

基于以上的生活经验,得知自己要到高校入职,笔者真是无比喜悦。最初,笔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期待,然而入职以后,却逐渐发现自己的幸福指数其实并不高,而身边的同事也有类似的感觉。

论及这方面话题时,越是工作久的教师,心中的伤痛似乎就越深,因为他们多了一个纵向比较的维度。

这种不尽人意的状况,似乎与学校的办学层次关系不大。笔者曾在三家高校读书求学,并有在两所高校工作的经历,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高校都存在。

它似乎与教师们的关系也不大。现在,所有能够入职高校的教师基本上都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有着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掌握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技能。

现在所有高校基本都有宽敞的教室、像样的图书馆,都会购买能供学生们使用的学术电子数据库。即便学校内的设施跟不上,学生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海量的免费学习资源。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教师工作幸福指数不断下降呢?经过多年的仔细观察,笔者发现,它与学校的主体、老师的服务对象——学生们的队伍结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迟到一事,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内疚,总是大摇大摆地闯进教室。进入教室以后,这些学生会习惯性地往教室的后面或是角落坐,能离讲台多远就离多远,能离老师多远就离多远。这些学生常常会带着早餐进教室,但是却不一定愿意带上书包、笔和纸等必需的学习用品,然而他们的手里却总是习惯性地攥着一部手机。

当老师讲课,这些人或是趴在桌子上似睡非睡,或是虽然坐在那里,但脸上的表情却是昏沉或迷离的。他们还会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地拿出手机玩。

这些额外精力的付出,使老师们能够讲授的知识容量和难度,较之预期大大缩水,课因此上得既慢又浅。当老师们用心去备课、精心去策划时,这些学生却无动于衷。反应冷漠的他们,上完了一节课以后,甚至夸张到都不知晓老师的性别。

大家所见的是,只有通过媒体曝光,违法、违规的校规才会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对违法、违规校规的处理,往往只是停止执行,学校有关负责人并不会被追究责任,而这类行为的结果很严重,不仅相关学校负责人要被追究责任,同时也会对学校的教育形象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要实现教育家办学,在办学中就要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师生权利,必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实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家有多重要。显然,对于类似迈克尔·阿彻多这样的教师来说,自由的背景结构更有利于学生适应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多样的需求。(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许悦编译)

留意大学校园的「隐性乞丐」

柏红秀

(作者系扬州大学教授)



图片来源:汇报网